

ERIA 讨论论文系列

No. 541

实现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产业政策¹

Masahito AMBASHI

奈良女子大学东盟与东亚经济研究所(ERIA)

HARAOKA Naoyuki

日本经济基金会

Fukunari KIMURA

ERIA

SAWADA Yasuyu

ki

东京大学

Masakazu TOYODA

日本经济基金会

URATA Shujiro URATA

经济、贸易和工业研究所 (RIETI) ERIA

2025 年 2 月

Abstract: 这篇论文强调了需要制定针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重新调整的工业战略，这些地区通过工业化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建议的战略强调将数字化整合到工业和发展的政策中，以促进创新。

在全球工业政策重新兴起的背景下，本文旨在通过应用积累的经验知识和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来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此外，它还提供了亚洲历史发展策略的全面概述，并提出了这些策略应如何适应未来挑战和机遇的见解。

关键词： 东亚和东盟、产业政策、循证决策、数字化

果冻分类： L52 ， O14 ， O21 ， O53 。

¹ 这篇论文基于ERIA和日本经济基金会于2022财年联合开展的项目“关于疫情后复苏及亚洲可持续发展新策略的研究”的研究成果。

1. Introduction

Newly工业化的经济体（NIEs）在亚洲（即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在二战后实现了显著的经济起飞。世界银行（1993年）将这一现象称为“东亚奇迹”。随后，其他东盟成员国（AMS，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也纷纷效仿；这些AMS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重新调整了政策，从进口替代转向依赖外国资本并促进出口。如今，亚洲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驱动力，并成为全球增长中心。2020年，东盟、中国、日本和印度合计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约30%（见表1）。从这些趋势来看，可以几乎确定未来全球经济重心将进一步向亚洲转移。

表 1：2021 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国家 / 地区	名义 GDP (十亿美元)	分享 (%)
美国	23,681	24.3
欧洲联盟	17,494	18.0
中国	17,759	18.2
Japan	5,040	5.2
东盟	3,402	3.5
印度	3,167	3.3
Others	26,859	27.6
世界	97,403	100.0

东盟 = 东南亚国家联盟，GDP = 国内生产总值。注：名义GDP根据美国当前价格计算。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SPROLLS/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s>（访问日期：2024年12月13日）。

尽管亚洲历史上经济增长强劲，该地区现在面临着重大挑战。首先，COVID-19疫情于2019年12月在中国武汉首次被报告，并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在2020年和2021年陷入衰退。疫情还加剧了国家间的经济差距（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以及国内的经济差距（即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之间）。此外，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正在增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第二，2022年2月爆发的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突显了地缘政治风险。这种地缘政治不稳定引发了成本推动型通胀的担忧。

由于资源短缺和物流中断导致的通货膨胀。第三，经济安全问题在加剧的地缘政治风险背景下受到讨论。中美贸易战不仅增加了两国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还加速了它们经济的脱钩。美国及其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讨论如何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即如何确保稀缺资源、重新制定全球生产网络以及保护关键技术）。这可能会影响依赖中美两国贸易和投资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特别是AMS国家。

第四，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如人工智能（AI）、大数据和机器人技术，同时引发了更广泛的产业和技术转型，这一过程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4IR），并在疫情期间得到了加速。预计4IR将提升生产率和技术创新，从而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然而，与此同时，它也创造了重新技能培训被自动化取代的工人以及培育利用这些新技术机会的企业家精神的必要性。

最后，长期挑战，如气候变化和更广泛的环境破坏不能被忽视。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节约能源和使用可再生能源来实现去碳化，并学会适当管理气候灾害。转向以循环经济为重点、注重回收的经济模式至关重要，这一挑战的紧迫性通过海洋塑料废物等问题得到了突出体现。亚洲许多挑战体现在联合国于2015年采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²

AMS已经达到了必须追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阶段，并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代表的停滞状态。确实，在应对挑战的同时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将使亚洲能够向世界展示“亚洲发展模式2.0”。他们必须能够通过获取和利用最新的研究发现来调动市场和产业政策措施的力量。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亚洲最新的问题和各种政策响应，提出潜在的产业政策，以帮助实现实质性的经济发展。

² 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了社会、经济和环境等17个领域的广泛目标，包括减贫、健康与福祉、工业和创新、气候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等，旨在到2030年实现这些目标。详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https://sdgs.un.org/goals>。

本文结构如下。第2节回顾了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日益浓厚的全球兴趣中的工业政策辩论。详细介绍了工业政策的定义、特征和意义，并结合现有实证文献进行了阐述。第3节展示了亚洲地区考虑数字化的有效发展策略。第4节构建了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框架，第5节则总结并提出了推荐的政策措施方向。

2. 产业政策辩论

这一部分回顾了公共政策，特别是工业政策中存在的现有问题，特别是在制定发展策略中政府角色方面。分析了工业政策在实际政策制定和学术界日益增长的兴趣，并详细介绍了相关的重要经济学研究，同时强调了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EBPM）的重要性。

2.1. 全球对产业政策的兴趣与日俱增

关于工业政策有效性的辩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特别是以战后日本和东亚的经验为背景（Johnson, 1982；World Bank, 1993）。随着美国和欧洲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华盛顿共识，该共识倡导市场自由化、去监管化以及小政府理念，并被应用于发展中国家。例如，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建议，通过市场导向的经济和结构性改革对印度尼西亚、大韩民国和泰国实施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此后，产业政策遭到了全球的无知。³ 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政府采取措施扩大特定sector的国内需求（例如，支持环保汽车），并救助私营公司（例如，通用汽车），以应对意外的外生需求冲击。自此之后，产业政策再次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法。

³ 有观点认为，美国和欧盟实际上是以发展国家的名义使用了产业政策，并同时坚持华盛顿共识的原则（Wade, 2014）。在美国的一个非典型案例中，国防部的国防高级研究项目局（DARPA）通过联邦资金支持了许多私营企业、研究机构 and 大学，为互联网和全球定位系统（GPS）等基础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种研发资金的模式也被应用到其他政府部门，如能源领域（Azoulay et al., 2019）。此外，欧盟也实施了类似的政策。事实上，出口补贴等产业政策，以发展空客。

在美国，拜登总统于2021年3月宣布了美国就业计划，该计划是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提出的。该计划包含强大的工业政策要素，包括对交通和公用事业（如道路、港口和码头、供水系统）的投资，高速宽带，科学和技术的研发（如半导体、高速通信技术、生物技术和量子计算），以及国内制造业和小型企业。2022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案》。⁴ 并且，《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Plus）》和《通胀减少法案》提供了新的资金以促进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并推动能源安全以及抑制高通胀。

中国于2015年5月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旨在将中国定位为世界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2025》确定了10个前沿领域的20个行业（例如，下一代信息技术和节能及新能源汽车），目标是通过提升竞争力来增加关键产品的国内生产，到2025年实现这一目标。中国还提出了双循环战略，包括国内和国际双循环，以加强韧性的供应链、增加国内消费和生产，并促进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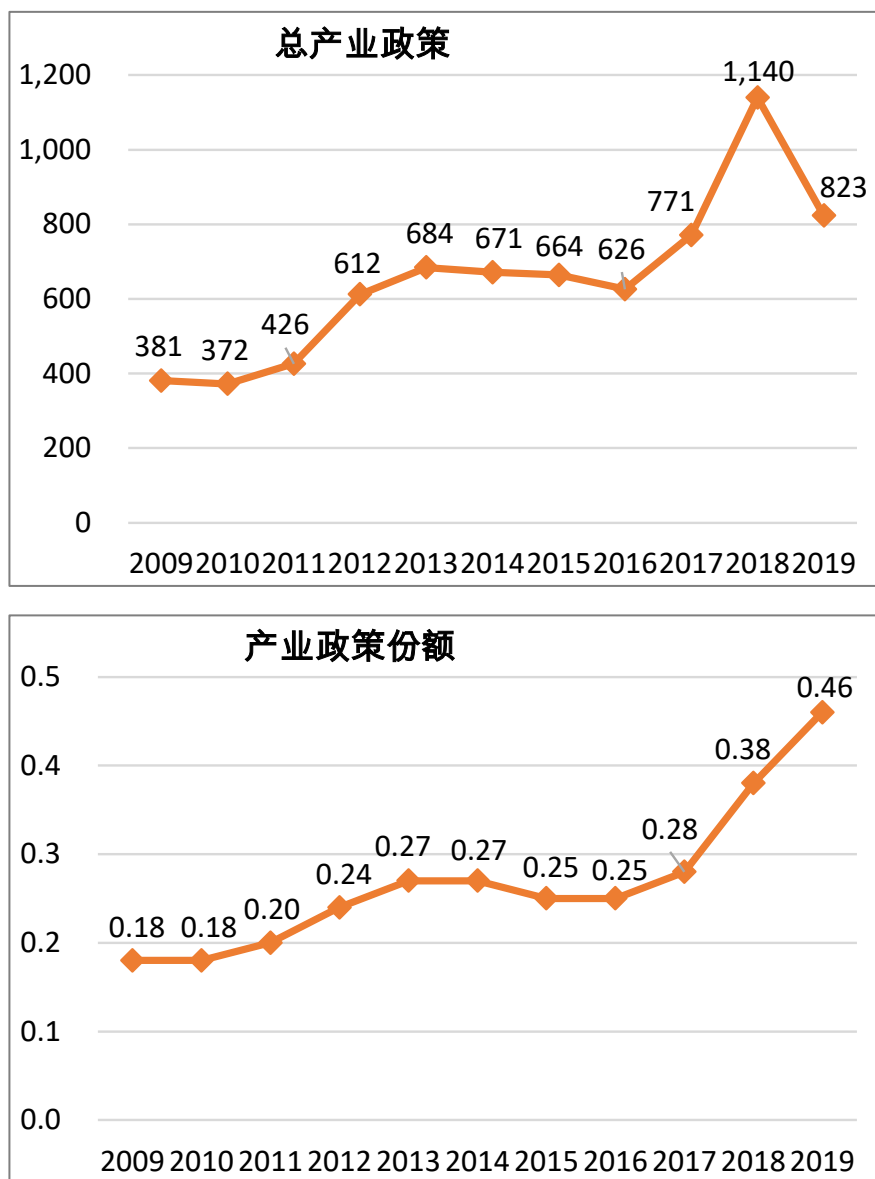
受美国和中国的影响，日本经济产业省于2021年6月提出了《创新与经济及工业政策》。该政策倡导以使命为导向的产业政策，旨在应对当前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如数字化和气候变化。该政策的目标是在市场失效方法之外，通过国家的支持来创造和塑造市场，这与传统的产业保护措施和简单的结构性改革方法不同。

因此，“工业政策”相关的政策措施是否正在增多？Juhász等人（2022）运用机器学习方法分析了2009年至2020年间出现在Global Trade Alert数据库中的政策相关文本。根据他们的分析，约25%的文本涉及工业政策，并且自2010年以来这一比例确实有所增加（见图1）。研究显示，补贴和出口促进措施逐渐取代了进口关税，高收入国家比低收入国家更可能实施工业政策。相比之下，Evenett等人（2024）发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对进出口商品施加贸易限制方面比发达国家更为倾向于采取行动。他们的研究还强调了工业政策措施与报复及政治经济因素之间的关联。

⁴ 创建有用的激励措施来生产半导体。

考虑的因素并未与通常用于justify工业政策的市场失灵主流理由明确对齐。

图 1：产业政策的时间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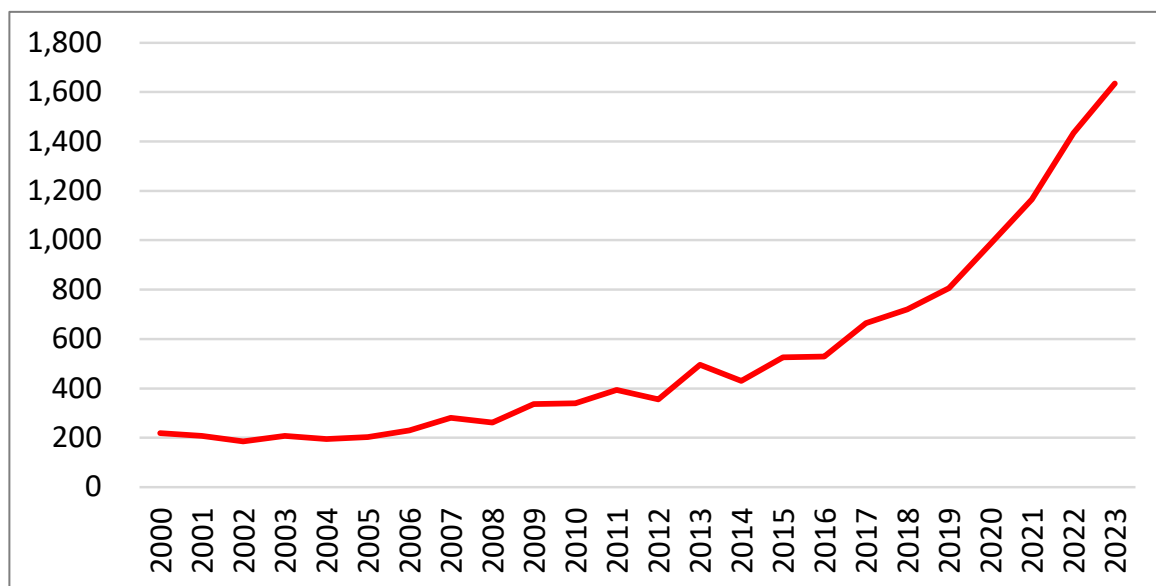
注意：本研究检查了全球贸易警报的文本数据库
2009 年和 2020 年使用机器学习方法。
资料来源：Juhász 等人(2022 年)。

2.2. 学术界工业政策的复兴

基于Dimensions科学研究数据平台进行的一项搜索中，选择了“工业政策”作为关键词、“经济学”作为研究类别、“标题和摘要”作为搜索位置，以及“文章”作为出版类型。搜索结果显示，从2000年的219条记录增加到2023年的1,635条记录，这表明相关文献的数量有所增加。

自 2010 年代以来，有关产业政策的英语学术论文大幅增加(图 2)。

图 2：2000 - 2023 年“产业政策”搜索次数总数



注：以“产业政策”为关键词，以“经济”为研究的搜索点击数类别，“标题和摘要”作为位置，“文章”作为出版物类型。
来源：作者。

考虑到经济学领域的论文总数也在增长，数据显示，与所有经济学论文相关的被引次数的比例从2000年的0.9%上升到2023年的1.5%。此外，更多的研究通过显示只有一篇使用“工业政策”作为关键词的文章发表在了经济学顶级期刊的前五名中，也发现了相同的趋势。⁵ 在2000年至2009年期间，共发表了8篇相关论文；而在2010年至2019年间，这一数字增加到8篇（Okazaki, 2020）。工业政策在政策制定中被越来越多地使用；相应地，学术界对该主题的兴趣也在增长。然而，关于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工业政策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希望本文能够填补这一空白。

2.3. Defining Industry Policy

一般来说，关于产业政策的学术研究大致有两种方法（Juhász等，2022）。一种方法是由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提供的（例如，Stiglitz, Lin等）。

⁵ 排名前五位的经济期刊是 美国经济评论，计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杂志，经济学季刊，and 经济研究综述。

蒙加, 2013 ; 林, 2014 ; 切里夫和哈桑诺夫, 2019 ; 哈桑诺夫和切里夫, 2019。在他们看来, 当市场在规模经济、公共产品、外部性、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或协调失败等方面出现失效时, 政府干预是合理的, 以纠正资源配置市场的低效率。工业政策的作用在于通过改变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来塑造消费者和企业的激励机制, 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第二种方法是发展型国家的观点。战后日本、韩国和台湾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发展, 被用作实施此类工业政策的国家的例子 (Johnson, 1982 ; Amsden, 1989 ; Haggard, 1990 ; Wade, 1990 ; Chang, 1994 ; Amsden and Chu, 2003 ; Kohli, 2004)。这一观点认为, 国家的角色不仅限于解决市场失效问题, 还应涵盖经济发展的更大目标, 包括减少贫困和实现可持续性。一些“发展主义者”坚持认为, 理想的经济结构应该明确界定, 并且国家应在此过程中发挥更为广泛和关键的作用。具体而言, 他们指出一种以使命为导向的经济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 国家在创新中处于领先地位, 承担创新的风险而非私营企业 (Mazzucato, 2013, 2021 ; Kattel, Dreschsler, Karo, 2022)。这样的“雄心勃勃”的工业政策将创造新的市场, 并决定国家增长的方向。

因此, 由于人们对工业政策作用的理解方式多样, 尚未形成统一认可的定义。关于工业政策的界定努力已在学术界和国际组织中持续进行。未来, 本文采用经合组织的一项研究来定义工业政策——即涵盖所有旨在结构性改善国内企业部门绩效的各种工具 (Criscuolo等, 2022a)。⁶ 工业政策可以包括技术政策和支持企业 (尤其是初创企业) 的政策, 因为其目标是支持工商界。

工业政策不仅限于制造业领域, 还适用于所有商业领域, 包括农业和服务业领域。根据这一广泛定义, 即使不是明确标定为工业政策的政策, 如果它们有助于提升这些领域的竞争力, 也可以涵盖在内。

⁶ see Warwick (2013) 和Aiginger及Rodrik (2020) 有关工业政策更多定义的论述。Rodrik (2004) 将工业政策定义为“有利于更动态活动的一系列重组政策, 无论这些活动是否位于制造业或具体的产品制造领域”。类似地, Rodrik (2008) 强调, 工业政策的目标是“刺激特定活动并促进结构性变革”。

business sector (例如, 通过税收减免促进企业在数字化或工业 workforce 的人力资源发展方面的投资)。例如, 即使是针对拥有合格学位的软件程序员提供的税收优惠也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工业政策, 因为它可以促进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产业的发展 (Manelici and Pantea, 2021)。根据这里定义的工业政策, 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开发主义者的政策都可以包括在内, 因为它们旨在引导结构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 工业政策不应仅由工业化国家垄断; 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空间积极利用工业政策以增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工业竞争力。

也需要注意到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传统上, 竞争政策被视为与产业政策相对立, 因为后者可能会严重扭曲市场机制。然而, 这两种政策应当得到协调。最近的研究表明, 在适当的竞争政策指导下, 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更为有效 (Aghion等, 2015)。鉴于竞争政策旨在通过竞争压力提高企业效率和消费者剩余, 根据本文的定义, 此政策可以被视为产业政策的一部分。

一些学者甚至更广泛地定义了产业政策。斯蒂格利茨和格林伯格 (2013, 2014) 认为, 宏观经济稳定政策, 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 从促进经济和社会学习的角度来看, 也是产业政策。他们强调, 为了防止由于无形资产和人力资本的滞后特性导致企业、组织和工人积累的学习成果恶化, 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应作为产业政策来实施。然而, 财政、金融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通常被用作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措施, 并不旨在对企业的结构性进行改进。因此, 在本文中, 宏观经济政策并不属于产业政策的范畴。

Mazzucato (2021) 探索了另一种非常广泛的工业政策视角, 涵盖了应对气候变化、疫情和其他挑战等方面。这种扩展的工业政策定义在当今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值得一些关注; 然而, 它并不包括本文狭义上的讨论范围。例如, 建立制药供应链以应对疫情仍然属于卫生保健政策的范畴, 并不归类为支持企业部门的工业政策。另一方面, 旨在使农业生产更加高效化的政策则更多地属于农业政策范畴, 而不是工业政策。

高效可以被视为促进农业部门的产业政策。

2.4 产业政策的意义及其措施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工业政策价值的争论一直存在。虽然有些人对其有效性表示怀疑（Krueger, 1993; 1995），但另一些人认为，在实际经济中存在着市场失灵现象，因此支持工业政策。从这种观点来看，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并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政府积极干预是正当合理的，尤其是在各国之间存在竞争的情况下。事实上，产业政策。

Infant工业保护既是工业政策中具有争议性又常见的措施，发展中国家（包括发展中成员国AMS）在其初期发展阶段积极采用这一措施。该政策假设，在工业发展的过渡阶段，通过关税壁垒和其他限制暂时限制进口是必要的，直到技术足够先进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即固定成本降低的效果），以及目标行业产生马歇尔外部性（即正外部性效应）（Harrison和Rodríguez-Clare, 2010）。然而，人们对其提出了质疑，认为它偏袒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抑制了公平竞争，并加剧了创新和生产率提高的难度。政府保护因此往往导致“扶持失败者”和受保护既得利益行业的寻租行为。例如，尽管一些发展中成员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试图通过发展重化工业来工业化，但普遍的看法是，这种婴儿工业保护几乎未能推动工业发展。此外，工业政策措施还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针锋相对的报复性行动（Evenett, 2024；Rotunno和Ruta, 2024）。

技术发展政策也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工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实施。技术发展具有正外部性，表现为对未参与的技术企业产生的溢出效应。这意味着，社会投资于技术研发的回报率将高于私人投资回报率，导致私人投资水平低于社会最优水平。这种正外部性机制被视为政府支持技术研发正当性的理由（Bloom, Van Reenen, Williams, 2019）。⁷ multinational企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工业枢纽的建立。

⁷ Bloom，Sankerman 和 Van Reenen(2013) 估计研发投资的社会和私人总回报率分别为 5 % 和 21 %。

已经应用于加速技术转移并为国内私营企业部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包括AMS，2018）产生外溢效应。尽管研发支持和强化知识产权制度在发达国家很受欢迎，但鉴于这些国家的研发投入相对较少，政策制定者应给予更多关注（Ambashi, 2019）。

舒马赫工业动态论认为，新企业的进入并实现创新和生产率提升可以推动低效现有企业的退出（Aghion 和 Howitt，1992）。这种“创造性破坏”体现了产业政策在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以生成更优工业动态方面的作用。因此，鉴于工业动态的需求，应控制亚洲经济体中普遍存在的“裙带资本主义”，即优先扶持与政府权力有密切关系的企业。此外，信息不对称阻碍了对私营企业，尤其是微小、中型企业的信贷资源分配效率（Stiglitz 和 Weiss，1981）。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机构可能不如私营企业熟悉具体商业项目，借款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可能难以获得资金（Banerjee 和 Duflo，2005）。鉴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的普遍不完善性，政府通过公共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支持以解决金融市场的不完善问题是必要的。

此外，在协调失败可以通过政府干预得到缓解的情况下，存在这样的情况。在一个固定成本和不确定性并存的行业中，企业可能会因为担心不确定性而避免承担固定成本从而不进入市场。政府干预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加速新企业的进入（Bolton 和 Farrell，1990）。在此情况下，采取主动设定行业标准的政策以鼓励企业活动被视为政府的角色。另外，当制造业活动通过供应链相互联系时，产业政策在处理外部性方面非常有用（Liu，2019）。因此，AMS仍需设计有效的产业政策，充分利用国际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这些网络在亚洲地区得到了加强。

然而，工业政策可能由于其强烈倾向于支持特定现有企业而抑制新的进入者。支持少量企业的政策可能不会提高整个行业的生产率或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因此，有必要尽可能将工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相结合，以促进工业的动态发展。

2.5. 横向和纵向(目标) 政策

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经常辩论应采取哪种类型的工业政策，即横向政策还是纵向政策。术语“目标政策”有时被用来代表纵向政策。担心“政府失败”的经济学家主张采用横向政策，在这种政策下，通过市场促进和监管改革来发展制度环境。横向政策适用于企业和行业，而不是扶持特定的企业和行业。然而，一些经济学家（而非发展经济学家）支持针对特定企业和行业的纵向工业政策（Aghion等，2021）。其中一个理由是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性。⁸ 选择性地发展特定企业和部门，在政府推动下取得成效，这表明即使拥有先进技术（如清洁去碳技术），某些企业也可能因过去的惰性而不愿采用。政府可能还需要通过激励特定企业来促进其投资，以克服协调失败。尽管工业政策的作用正在重新评估，简单地将其分为横向和纵向政策，并仅认可其中一种的做法似乎已显得过时。

工业政策可以大致分为三种工具：（i）对企业内部绩效直接产生影响的工具（例如，补贴、金融贷款、知识转移和基础设施发展），（ii）对行业动态产生影响的跨框架工具（例如，发展资本市场和促进劳动力流动、贸易和投资政策），以及（iii）需求侧工具，这些工具影响商品和服务（例如，产品监管和公共采购）（Criscuolo et al., 2022a）。⁹ 关键是根据目标选择合适的乐器或组合。

2.6. 循证决策

嵌入EBPM方法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进展对实际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Banerjee和Duflo，2012；2019）。EBPM已经扩展到经济学的其他领域，并且有人主张将其应用于产业政策。EBPM将经济分析的实证方法应用到政策分析中。世界各地已经开展了大量的产业政策实证研究。预计在AMS制定的国家发展战略也将依赖EBPM。

⁸ 路径依赖是指达到某一均衡状态（众多可能的均衡状态之一）的道路由背景和历史决定。QWERTY键盘就是一个例子。

⁹ Criscuolo等（2022a）澄清了工业政策和工业战略的概念。他们定义工业战略为一组连贯且相互关联的政策工具，旨在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例如，绿色转型或人工智能发展），并将这些策略分为部门导向型、使命导向型、技术导向型和地域导向型策略。

EBPM 是政策制定领域的一项近期革命，其中政策工具的选择基于证据。证据的定义是经过实证验证的政策因果效应。在 EBPM 中，这种证据的存在尤为重要，尤其是在确定政策工具时。这一概念起源于医学科学，并逐渐扩展到公共卫生、公共政策和开发政策领域。鉴于 EBPM 在政策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建议在处理公共政策应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时，适当运用证据（即，EBPM 是参与政策制定者的行事模式）。

基于围绕经济学发展起来的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casual inference 经常被用于政策领域的实证演示。在因果推断中，因果关系与相关性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分。在衡量政策干预效果时，证明因果关系至关重要。随机对照试验产生的证据被认为是最高质量的（Duflo, Glennerster, Kremer, 2008）。在随机对照试验中，政策的对象被随机分配到处理组或对照组。由于两组在平均特征上除了政策干预外都相同，可以通过测量结果变量的平均差异来衡量政策干预的因果效应。

然而，尽管随机对照试验是一种有效的验证政策效果的方法，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工业政策的本质原因，随机分配目标对象（如行业、企业或工人）从伦理和实践角度来看都是困难的。¹⁰ 通过工业政策分配治疗组往往会受到样本选择偏差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更具动力的企业和工人倾向于申请相关政策项目。因此，许多研究都是基于自然实验和准实验来进行的。退职观察数据，使用政策干预中的外生变化。¹¹ 结构估计和动态宏观经济一般均衡模型也是通过根据消费者和企业行为的经济模型校准结构参数，并估计政策干预对经济福利的影响来实现的，这通常是基于与假设情景进行对比的模拟结果。

总之，虽然关于产业政策的文献集中在相关性上

¹⁰ 迪艾顿和卡特赖特（2018）指出随机控制试验的局限性，并强调应将这些试验与其他方法整合起来，以理解政策干预措施为何有效。

¹¹ 因果效应识别方法的兴起，即通过自然实验和准实验来确定因果关系，被称为可信性革命（Angrist 和 Pischke, 2010）。这些代表性方法包括工具变量方法、回归断点设计、倾向得分匹配、差额差额法以及合成控制方法。有关这些方法的详细内容，请参见 Angrist 和 Pischke (2009) 及 Cunningham (2021)。

研究、新的经验主义方法论以及企业绩效管理 (EBPM) 强调了基于企业层面面板数据、历史事件和选择性地点政策变化的精确性、因果推断和经济结构。此外，最新文献促进了对工业政策影响的细腻理解，这种理解基于重新定义的治理理念、更广泛的政策工具范围以及去工业化现实 (Juhász, Lane, Rodrik, 2023)。虽然仅在有坚实证据时才实施政策是不切实际的，但在未来推动亚洲的工业政策和发展战略时，整合EBPM的核心要素是非常重要的。

2.7. 产业政策实证研究综述

以下子部分基于Lane (2020) 描述了工业政策实证研究中的趋势。最早期在2000年之前的实证研究强调了支持产业和企业的政策措施。然而，大多数研究忽略了由政治决策等因素引起的选择偏差，这些因素影响了目标产业和企业的选择。因此，工业政策的效果只能被解释为相关性而非因果效应，这使得评估所讨论的工业政策变得困难。

然而，自2000年后，工业政策实证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趋势。首先，虽然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分析已经可行，但现在可以通过生产函数和全要素生产率估计来估算工业政策对全国各行业的效应。其次，研究了将工业政策外生应用于特定地区（即基于地点的工业政策）的案例，通过比较处理地区与非处理地区的差异来识别因果效应 (Bernini 和 Pellegrini, 2011；Kline 和 Moretti, 2014；Pellegrini 和 Muccigrosso, 2017；Becker 等, 2018；Criscuolo 等, 2019)。再次，研究试图从历史事件中提取制度变革的经济影响。由拿破仑战争期间大陆禁运引发的婴儿工业保护研究 (Juhász, 2018)、马歇尔计划扩展至二战后的意大利 (Giorcelli, 2018)，以及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制造业的大规模推动 (Lane, 2022) 都是此类研究的例子。

大量研究近年来从EBPM的角度对工业政策进行了探讨，使用了多种数据和方法。然而，本文的目的并非全面回顾所有关于工业政策的经验性研究。重点在于通过参考Harrison和Rodríguez-Clare (2010)、Lane (2020)、Morikawa (2020) 以及Criscuolo等人 (2022b) 的研究，探讨与发展中经济体相关的垂直和水平工业政策的经验证据。

和 Juhász 等人 (202

3 年)¹²

作为垂直工业政策的一个例子，巴西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微型计算机产业保护政策禁止进口外国制造的微型计算机，以培养本国产业。然而，在国内微型计算机产业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微型计算机价格的同时，它未能赶上美国的水平；最终，巴西政府废除了这一政策（Luzio和Greenstein，1995）。与此同时，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将重点放在重化工和工业活动上；通过支持性政策，它成功地增加了产量和出口，提高了生产效率，并通过网络效应惠及下游产业（Lane，2022）。这种对供应链中下游企业的积极影响与现有研究中发现的负面影响形成了对比（Blonigen，2015）。此外，虽然目标补贴对于年轻的小型企业比大型企业及跨国公司更为有效（Bronzini和Iachini，2014），但国际工业分配中的低效率也得到了识别（Kalouptsi，2017）。

尽管有些研究使用外生历史事件发现行业保护措施产生了积极效果（例如Juhász, 2018），但这类政策的有效性仍存在争议。然而，可以几乎确定的是，仅靠保护并不能使国内产业具备国际竞争力。至少，在政策制定者设计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时，必须避免错误的技术偏向，并且需要考虑一个国家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整个工业生态系统。

除了针对投资特别是研发（R&D）的补贴和税收优惠外，横向工业政策还包括竞争和监管改革政策以及国际贸易与投资政策，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商业环境（即制度条件）。第一类横向工业政策包括推动结构性变化的重要渠道，这些变化加快了高效率（低效率）企业的进入（退出）。通过激烈的竞争压力促进新技术和创新的采用，同时优化资源配置（Aghion等，2005年）。随意保护国内企业和行业免受竞争是不可取的；必须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相协调。在中国进行的研究表明，当补贴和其他形式的产业政策以目标竞争领域或通过目标促进部门内的竞争的方式实施时，它们的效果会更好。

¹² 工业政策还针对个体类别，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政策、企业法律、知识产权、标准、创业以及节能和新能源推广。

新的高生产率企业加入，企业的整体生产率得以提升（Aghion等，2015）。其他研究显示，在没有低效企业退出机制的情况下，对企业的研发支持效果不佳（Acemoglu等，2018）。关于监管方面，一项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工业数据的研究表明，上游行业中的反竞争监管会导致下游行业的生产率下降，这凸显了推动监管改革的必要性（Bourlès等，2013）。

另一种类型的横向工业政策更适用于希望培育强大产业部门的发展中国家。许多研究表明，简单的保护性贸易措施在提高生产力方面无效作为工业政策。实际上，使用企业级数据的研究表明，促进自由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能够通过进口竞争、中间商品价格降低、知识溢出以及国内企业的学习效应等因素，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生产率的提升和创新（Pavcnik, 2002；Javorcik, 2004；Todo and Miyamoto, 2006；Amiti and Konings, 2007；Shu and Steinwender, 2019）。¹³ 有些学者认为，通过跨境知识溢出动态获得的贸易收益远大于发达国家内部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基于比较优势的静态收益（Hsieh等，2019；Hsu、Riezman、Wang，2019）。这些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通过上述渠道促进了国内行业的结构性变化。随着自由贸易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政策的推进，这些措施将继续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政策中发挥核心作用。

2.8 产业政策的宏观经济评估

宏观经济文献中关于资源配置的研究讨论了产业政策的影响。使用宏观经济模型评估产业政策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同时考虑宏观经济一般均衡效应，从而进行全面的成本-效益分析。理想情况下，应同时展示政策效果的统计显著性和定量显著性。

宏观经济研究通常表明，由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作为经济增长核心要素的全要素生产率仍然较低。

¹³ 虽然观察到在欧盟，企业通过与中国的竞争增加了专利活动、信息技术投资和生产率（Bloom, Draca, Van Reenen, 2015），但竞争对美国企业的专利活动和研发投入产生了负面影响（Autor等，2020）。

克伦（2009）和雷斯特丘亚和罗杰森（2008）得出结论认为，拖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资源配置低效率是由政策导致的。阿尔瓦雷斯-库拉多和皮涅塔（2009）以及埃斯特班-佩特尔和萨瓦达（2014）分别通过新古典多部门增长模型研究了马歇尔计划在二战后欧洲的影响和日本的产业政策，并表明这些政策效果微乎其微。这些研究集中在产业政策对资源配置造成的扭曲上，对其实效性提出了质疑。然而，海希和普雷斯科特（2008）以及埃斯特班-佩特尔和萨瓦达（2014）指出，日本战后的高增长率的关键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被消除。这一观察结果强调了促进国内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包括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如道路和高速铁路）、城市住房开发和区域工业集群来推动。

3. 东盟成员国发展战略与数字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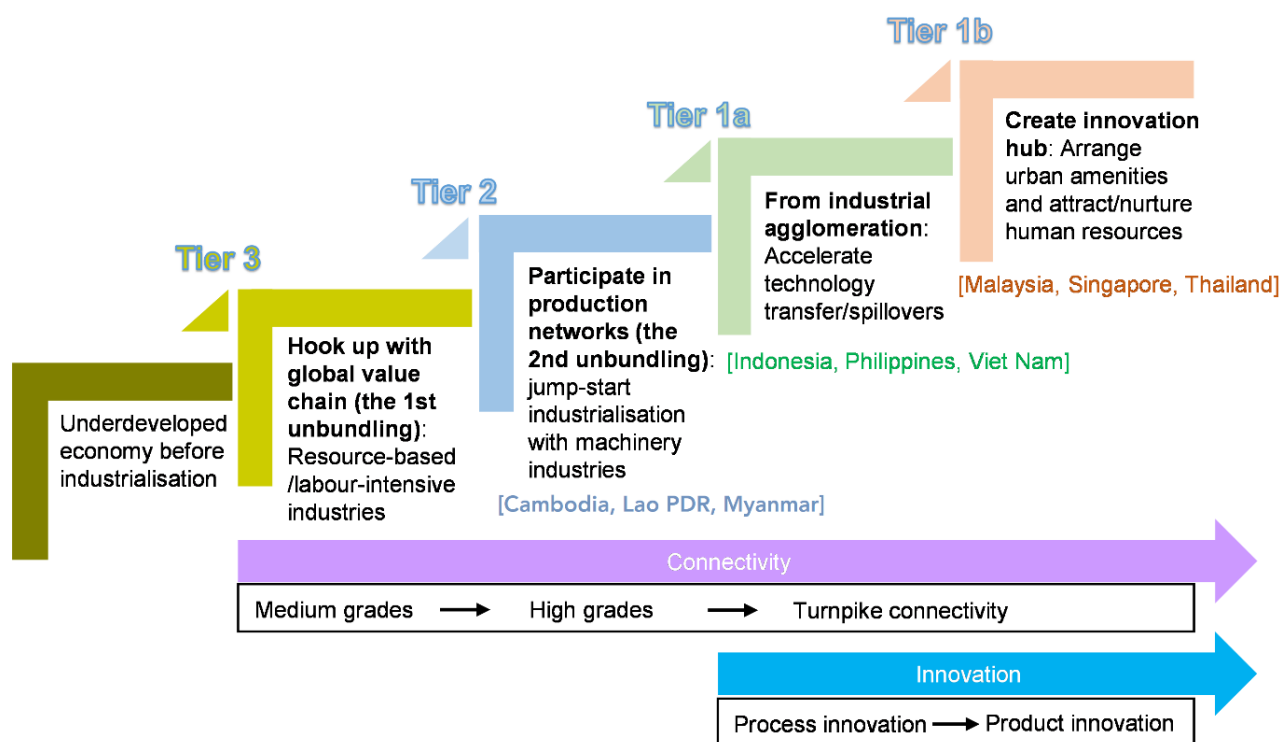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在二战后的时期，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NIEs）的物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显著积累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背景，这一过程主要由工业化和出口扩张驱动。其他东盟成员国（AMS），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随后也经历了成功的经济发展。这种经济发展的历史模式被称为“雁行模式”。接下来将考察这些AMS的发展过程。

AMS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实施保护性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该策略通过限制进口来鼓励国内生产）的情况下经历了增长速率的下滑。认识到这一策略的局限性，这些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起采用了依赖外国资本、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策略作为其发展政策的基础。自1990年代以来，它们通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例如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东盟全面投资协议）进一步深化了与全球价值链的经济整合。201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建立以进一步深化经济整合。

东盟近期的工业发展策略基于区域制造业的专业化，主要集中在汽车和电气机械等行业。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制造过程和任务的国际分工也有所进展，跨国公司积极参与零部件和最终产品的贸易。据此，世界上最深的国际生产网络被根据不同AMS发展阶段加以利用。

(Figure 3) 因此，individual AMS（东盟成员国）实现了异常显著的经济增长、贫困减少以及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不仅通过利用世界上最深的生产网络，还通过发展基础设施和改善投资环境。东盟及东亚经济研究机构（2015）展示了以发展阶段为基础的工业化的东盟发展策略。¹⁴

图 3：东盟工业发展战略



资料来源：ERIA (2015)。

尽管AMS已经实现了稳步的经济发展，它们仍需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如泰国）普遍担心，其经济增速可能在长期内停滞在当前的中等收入水平（或人均GDP），而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¹⁴ 各种作者详细阐述了增长理念，这些理念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应用。希达尔戈等（2008）展示了“产品空间”这一概念（即交易产品之间的相关性），解释了为何复杂产品难以在发展中国家生产。豪斯曼、罗德里克和维拉斯科（2008）提倡使用“增长诊断”的决策树方法，以帮助识别并消除制约个别国家增长的瓶颈。林（2014）提出了新的结构经济学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利用其潜在的比较优势来生成动态的工业结构。

在未来。当这些中等收入国家（AMS）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地位时，必须制定新的发展策略，并培育新的高附加值行业，以实现生产率提升和创新（Ambashi, 2020）。

数字转型预计将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数字转型鼓励在任务和人类层面进行劳动分工，正如国际劳动分工从第二次拆分向第三次拆分转变所见证的那样（Baldwin, 2016）。这一转变导致了技术、创新和组织的急剧变化。具体来说，从工业化进程中侧重于逐步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的“渐进式创新”转向旨在引入新产品和服务并创造新市场的“颠覆性创新”。在基于数字转型的颠覆性创新中，以往积累的技术和知识可能并不重要。因此，跨越式经济发展——即跳过预期的立即发展阶段——成为可能（ERIA, 2022）。智能手机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在东盟成员国广泛采用智能手机后，线上购物、电子支付和打车服务等新的商业领域得以开拓，从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标准（Ito, 2020）。

AMS计划将现有行业与数字化融合，这被称为数字化转型。2011年，马来西亚在总理办公室下设立了特别创新单位（Unit Inovasi Khas），与马来西亚创新协会共同在国家层面整合创新政策。泰国则引入了其 **泰国 4.0** 倡议于2014年启动，旨在通过培育高附加值产业和超越现有的重工业阶段及对外资本依赖，将国家转型为发达国家。2021年，泰国推出了生物循环绿色（BCG）经济模式以进一步支持泰国4.0战略。该模式依托科学、技术与创新，促进资源高效利用并创建可持续的经济体系。此外，印度尼西亚引入了 **印度尼西亚 4.0**，一个2018年的 roadmap。它旨在引入第四次工业革命（4IR），以 revitalise 印尼的制造业部门（例如：食品加工、纺织、汽车）。

为了实施这些发展策略，政策制定者需要根据之前详细阐述的经验研究结果，将具体的产业政策工具纳入发展策略中。在AMS早期发展阶段，产业政策的作用已经得到了认可，这得益于亚洲显著的增长经验（ADB, 2020）。在当前数字化时代，也需要证明产业政策如何在更高发展阶段体现和促进工业发展策略的有效性。假设

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对于发展新行业至关重要，在这些行业中，创新相关的知识溢出效应显著，工业政策的作用应重新考虑以形成有效的亚洲发展策略。

与此同时，正如罗德里克（2004）指出的那样，必须强调工业政策在AMS（新兴市场国家）相对成功的原因。具体而言，AMS利用了诸如基于结果的竞争促进、明确的政策目标、日落条款以及有效的执行机制等有利特征（ADB，2020）。此外，长期的发展愿景和指导方针为发展战略提供了支持，这得益于具有远见的政治领导人；能够将领导人的理念纳入工业政策的强大控制塔；以及高效、以能力为导向的文官政府（Ohno，2009）。¹⁵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4）所指出的，工业政策措施应具有针对性、时限性、成本效益、透明性，并以明确目标为导向，以确保其有效性。AMS应继续利用支持有效政策制定和实施工业政策的制度框架。然而，影响工业政策选择的政治力量以及政府执行这些政策的能力可能会成为“治理约束”（Juhász 和 Lane，2024）。因此，授予政府过多权力会存在“精英俘获”的风险（即精英阶层获取特权和贪污）。问责制和透明度、反腐败措施、广泛公民参与工业政策辩论以及治理的其他要素仍然必要。在日本，由来自产业界、学术界和社会团体的代表组成的政府咨询委员会通过信息共享和相互论证与信任，帮助确保了工业政策的治理。

尽管本文已经审查了亚洲工业政策成功的一些合理因素，政策制定者在广泛应用工业政策时仍应保持谨慎。总体而言，成功的工业政策依赖于各国的具体条件和环境。这表明工业政策并非总是有效的，因此必须根据每个国家不断变化的需求进行量身定制。

4. 可持续经济发展框架

在本节中，讨论了亚洲可持续经济发展框架。需要应对的经济挑战包括：（i）数字经济初创企业，以及（ii）

¹⁵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省、韩国经济规划委员会、马来西亚经济规划单位、泰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以及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局被视为各自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参与者。

环境问题和灾难。

4.1. Digital Start - Ups

中小企业占任何国家企业总数和员工总数的大部分；初创企业被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初创企业通过加速市场竞争促使低效企业退出市场（Haltiwanger, Jarmin, Miranda, 2013）。此外，它们作为创新的创造者产生了知识溢出效应，这是一种积极的外部性，其影响体现在邻近地区的其他经济实体的表现得到提升。关于信息技术服务是否可能成为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存在正反两方面的观点（Aghion等，2021）。然而，数字化进程已从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减少贫困和增强包容性的角度引起了对发展中经济体初创企业的广泛关注。

谷歌、苹果、脸书（现为Meta）、亚马逊和微软在美国是成功数字化初创企业的典范。这一趋势也在亚洲显现，中国的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公司发展壮大，并且它们在起步时并不需要巨额的初始研发投入。¹⁶ 所有所需的是一个数字化服务和对美国先驱者的创造性模仿（Kimura, Wong, Ambashi, 2019），这具有颠覆性创新的潜力。例如，在印尼，Gojek和Grab在拼车市场激烈竞争，复制了Uber的商业模式。印尼的拼车服务通过补充城市交通提高了消费者福利，并为许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数字初创企业在通过扩大就业来减少贫困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不容忽视。此外，伴随COVID-19疫情而来的封锁措施意外地推动了国家经济向数字化转型，并增加了业务交易和就业的社会包容性。

数字初创企业依赖于私营企业的原创性和创新性——这是政府无法直接创造的属性。相反，政府必须专注于八一下和软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相关制度环境，这些环境能够使数字初创企业在市场上自由活动而不会遇到任何困难。例如，高速互联网服务，如5G，是促进此类活动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数字初创企业依赖于私营企业的原创性和创新性——这是政府无法直接创造的属性。相反，政府必须专注于硬和软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相关制度环境，这些环境能够使数字初创企业在市场上自由活动而不会遇到任何困难。例如，高速互联网服务，如5G，是促进此类活动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¹⁶ Indonesian年龄段为18至64岁且是新兴企业家或新企业的所有者经理的人口占比在2018年为9.6%，马来西亚在2017年的比例为21.6%，菲律宾在2015年的比例为17.2%，泰国在2018年的比例为19.7%，越南在2017年的比例为23.3%——均高于日本在2021年的6.3%（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23）。

远程技术与物联网在生产线上应用的同时，必须继续发展传统的硬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等。如果没有这样的硬基础设施，无论电子商务接受度多高，都无法将实物商品送达消费者手中。此外，提升数字化初创企业的服务质量需要促进软基础设施的发展，例如金融科技和电子支付方法。

数字初创企业和平台的显著增长已经明确了工业挑战。这些平台具有规模经济、网络外部性和显著的市场力量特征。主导玩家往往利用数据、制造创新壁垒，并从事反竞争行为，这引发了对垄断效应的担忧，如不公正定价和损害消费者福利的商品和服务销售（Tirole, 2023）。此外，由于数字企业收集的数据可能包括个人数据，因此必须从隐私保护的角度妥善管理这些数据。为数字初创公司工作的零工工人经常被迫承受不稳定收入，并受到不利条款和条件的约束。即使在发达国家，如果他们与数字企业之间没有雇佣关系，通常也得不到劳动法的保护。

这些担忧表明，在促进数字初创企业和平台时，政府必须建立适当的法规和制度框架，以应对反垄断执法、数据治理、公平竞争以及消费者和劳动保护等问题。此外，全球范围内数字企业的税收问题是一个重要议题，导致了对国际协调的呼吁。AMS也应该在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他国际论坛上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以寻求解决方案。

尽管发展中国家政府对数字初创企业寄予厚望，同时建立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制度体系以使本土企业能够充分利用数字化的潜力也至关重要。促进数字初创企业的工业政策应采取更为普惠的方法，以惠及更广泛的创业群体。

4.2 环境问题和灾害

环境问题是一种市场失败，其中必要的商品和服务未由市场提供以最大化社会福利。例如，伴随商业活动产生的空气和水污染会产生负面外部性，威胁健康。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限制过度的商业活动来最大化社会福利。

通过补贴和税收（即庇古式补贴和税收）或直接监管来减少污染。对于其他环境问题，则存在“公地悲剧”所体现的社会困境，即由于过度使用，公共资源如森林和渔业场所面临枯竭的问题。有时，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政府干预解决，给予相关方产权以适当管理这些资源。

今天，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灾害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灾害往往在基础设施较弱的发展中国家造成更大的破坏，例如1991年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爆发、2004年印度尼西亚的地震和海啸以及2008年袭击缅甸的热带气旋纳尔吉斯。然而，预防和减轻灾害的努力经常受到市场失灵的干扰。尽管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对岛屿和沿海地区构成了淹没威胁，但由于公共物品提供的免费搭车问题，通过市场力量提供适当的防洪墙、堤坝和其他必要基础设施仍然非常困难。当灾难发生时，确保和维持生命线（如电力和供水）是政府最紧迫的任务。私人保险市场对灾害造成的损失提供的赔偿有限，保险市场非常不完整。

因此，工业政策对环境和灾害管理是否相关？根据本文对工业政策的一般定义，旨在通过发展节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来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属于这一范畴。为此，有必要建立一种机制，激励企业开发环境和能源技术，并确保这些技术能够在市场上顺利运行。鉴于企业所使用的技术路径依赖性，有时需要提供强有力的激励措施以替代高碳、污染的技术为低碳、清洁的技术（Aghion等，2016）。除了碳税之外，研发补贴、税收减免以及建立知识产权和金融市场以促进清洁技术转型的政策都是可行的选择。政府为清洁技术采购制定的公共采购政策也可以预期会产生吸引私人投资和资金的效果（即“撬动效应”），并鼓励私营企业率先开发新技术原型，作为技术创新的第一步（Howell，2017）。

提供企业灾害保险是利用市场机制应对灾害管理的另一种方式。在大多数金融市场监管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建立这种保险方面提供支持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其初期阶段。应对环境问题和灾害主要涉及：

通过发展这类未充分开发的市场，政府可以通过工业政策在私有企业中推动市场创造和塑造（Mazzucato, 2013; 2021）。

政府的主要角色是在环境问题和灾害管理等领域直接应对市场失灵，并通过工业政策介入以发展相关技术并建立相应市场。在这些挑战面前，政府似乎可以在特定市场和技术领域应用垂直的工业政策。

5. Conclusion

在本文中，强调了制定新的策略以推动亚洲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的重要性。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应当重新考虑工业政策的作用，将其作为加强企业部门和转变经济结构的工具。

empirical 知识关于产业政策进行了实证审查，确认了基于证据导向政策制定（EBPM）的显著需求。同时，还研究了亚洲地区（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战略历史，以及未来如何通过产业政策进一步发展。最重要的是，数字化应被纳入发展战略中。

尽管世界面临各种挑战，亚洲作为快速成长和不断增加考验的前沿地区，必须向世界呈现一个新的发展策略。

AMS需要平衡市场和政策力量，从而为国家发展战略创造一种新颖的应用。本文希望通过对相关讨论的阐述，满足这种期望，实现该地区乃至更广泛区域内的可持续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 Acemoglu , D. 等人 (2018) , “创新、重新分配和增长” , *美国经济评论* 108(11), pp.3450–91.
- Aghion , P. , C. Antonin , S. Bunel 和 J. Cohen - Tanugi (2020) *创新的力量
破坏：经济动荡和国家财富* , 马萨诸塞州剑桥：Belknap
哈佛大学出版社。
- Aghion , P. 等人 (2005) , “竞争与创新：倒 U 关系” , *季度
经济学杂志* , 120(2), pp.701–28.
- (2015) , “产业政策与竞争” , *美国经济杂志：
宏观经济学* , 7(4), pp.1–32.
- (2016) , “碳税、路径依赖和定向技术变革：证据”
来自汽车行业 , *政治经济学杂志* , 124(1), pp.1–51.
- Aghion , P. 和 P. Howitt (1992) , “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 ,
计量经济学 , 60(2), pp.323–51.
- Aiginger , K. 和 D. Rodrik (2020) , “产业政策的重生和二十一世纪的议程” , *工
业、竞争与贸易杂志* , 20(2), pp.189–207.
- Alvarez - Cuadrado , F. 和 M. I. Pinteá (2009) , “欧洲增长黄金时代的定量探索”
 , *经济动力学与控制杂志* , 33(7), pp.1437–50.
- Ambashi , M. (2018) *东盟创新政策* , 雅加达：经济研究所
东盟和东亚(ERIA)。
- (2019) , “东盟创新的政府举措” , *ERIA 政策简报*,
No. 2019 – 03, Jakarta: ERIA, <https://www.eria.org/publications/government-initiatives>
东盟创新物质 /
- (2020) , “新时代的东盟发展与创新战略”
工业化' , *ERIA 政策简报* , 第 2020 – 06 号 , 雅加达：ERIA ,
<https://www.eria.org/research/asean-development-and-innovation-strategy-in-the-new-industrialization>
新工业化
- Amiti , M. 和 J. Konings (2007) , “贸易自由化、中间投入和生产率：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证据” , *美国经济评论* , 97(5), pp.1611–38.
- Amsden, A. H. (1989) *亚洲的下一个巨人：韩国和后期工业化* , 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 阿姆斯登 , A. H. 和 W. W. Chu (2006) *后发：台湾的升级政策* ,
马萨诸塞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 安格里斯特 , J. D. 和 J. S. 皮施克 (2009) *多数无害的计量经济学：经验主义者的
Companion*,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2010), “实证经济学的可信度革命 : 如何更好的研究”
设计正在摆脱计量经济学的束缚 , *经济展望杂志* ,
24(2), pp.3–30.
-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2020 年) , *亚洲的繁荣之旅 : 政策、市场和
技术超过 50 年* , 马尼拉 ,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asias-journey-繁荣>
- Autor , D. 等人 (2020) , “外国竞争与国内创新 : 来自美国的证据”
专利 , *美国经济评论 : 见解* , 2(3), pp.357–74.
- 阿祖莱 , P. , E. Fuchs , A. P. 戈德斯坦和 M. 科尔尼 (2019) , “资金突破”
研究 : “ARPA 模型”的承诺与挑战 *创新政策和
经济* , 19(1), pp.69–96.
- 鲍德温 , R.(2016) , *大融合: 信息技术与新全球化* , 剑桥马萨诸塞州 : 哈佛大学
贝尔纳普出版社。
- Banerjee , A. V. 和 E. Duflo (2005) , “通过发展经济学视角的增长理论” , 载于 P.
Aghion 和 S. A. Durlauf (编辑) , *经济增长手册* , 纽约 : 北荷兰 , 第 473 - 552
页。
- (2012), *《穷人经济学 : 彻底反思全球贫困的方法》* , New
约克 : 公共事务。
- (2019), *艰难时期的好经济学* , 纽约 : 公共事务。
- 贝克尔 , S. O. , P. H. Egger 和 M. von Ehrlich (2018) , “欧盟区域政策的影响 :
1989 - 2013” , *区域科学与城市经济学* , 69, pp.143–52.
- Bernini , C. 和 G. Pellegrini (2011) , “私营企业的增长和生产率如何
受公共补贴影响 ? 来自区域政策的证据 , *区域科学和
城市经济学* , 41(3), pp.253–65.
- Blonigen B. (2015) , “产业政策与下游出口表现” , *经济
Journal* 126(595), pp.1635–59.
- 布卢姆 , N. , M. Sankerman 和 J. Van Reenen (2013) , “识别技术溢出效应”
和产品市场竞争 , *计量经济学* , 81(4), pp.1347–93.
- 布卢姆 , N. , M. Draca 和 J. Van Reenen (2015) , “贸易诱导的技术变革 ? 影响”
中国进口的创新、信息技术和生产力 , *经济研究综述* ,
83(1), pp.87–117.
- 布卢姆 , N. , J. Van Reenen 和 H. Williams (2019) , “促进创新的政策工具包” , *经
济展望杂志* , 33(3), pp.163–84.
- Bolton , P. 和 J. Farrell (1990) , “权力下放、复制和延迟” , *政治杂志
经济* , 98(4), pp.803–26.
- Bourlès , R. 等人。(2013) , “上游部门的产品市场法规是否受到限制”
生产率增长 ? 经合组织国家的面板数据证据 , *经济学综述
和统计* , 95(5), pp.1750–68.

Bronzini , R. 和 E. Iachini (2014) , “研发激励措施有效吗 ? 来自
回归不连续法 , *美国经济杂志 : 经济政策* ,
6(4), pp.100–34.

Chang, H. J. (1994) *产业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 纽约 : 圣马丁出版社。

谢里夫和 F·哈桑诺夫 (2019) , “真正的产业政策原则” , *Journal of
全球化与发展* , 10(1), pp.1–22.

Conningham, S. (2021) *因果关系 : Mixtape* , 纽黑文 : 耶鲁大学出版社。

Criscuolo , C. , N. Gonne , K. Kitazawa 和 G. Lalanne (2022a) , “产业政策”
经合组织国家框架 : 旧的辩论 , 新的观点 , *经合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 (经合组织) 科学、技术和技术
创新政策文件* , 第 127 号 , 巴黎 : 经合组织 , [https://www.oecd.org/sti/](https://www.oecd.org/sti/产业政策框架-OECD国家-0002217c-en.htm)
[产业政策框架 - OECD 国家 - 0002217c - en. html](https://www.oecd.org/sti/产业政策框架-OECD国家-0002217c-en.htm)

----- (2022b) , “产业政策工具有效吗 ?
经合组织国家 , *经合组织科学、技术和产业政策文件* , No.128,
巴黎 : 经合组织 ,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cience-and-technology/are-ind](https://www.oecd-ilibrary.org/science-and-technology/are-ind政策工具有效-57b3dae2-en)
[政策工具有效 57b3dae2 - en](https://www.oecd-ilibrary.org/science-and-technology/are-ind政策工具有效-57b3dae2-en)

Criscuolo , C. , R. Martin , H. G. Overman 和 J. Van Reenen (2019) , “产业政
策的一些因果关系” , *美国经济评论* , 109(1), pp.48–85.

Deaton A. 和 N. Cartwright (2018) , “理解和误解随机对照试验” , *社会科学与医学* ,
210, pp.2–21.

杜福尔 (E.) , R. 格伦杰斯特 (R.) 和 M. 克雷默 (M.) (2008 年) , 《在发展经济
学研究中使用时机化 : 一个工具箱》, 载于 P. 斯赫茨 (P.) 和 J.A. 斯特劳斯 (J.A.)
编, 《》。 *发展经济学手册* , 阿姆斯特丹 : Elsevier , 第 3895 - 962 页。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 <https://www.policyuncertainty.com/>

东盟和东亚经济研究所 (ERIA) (2015) , *亚洲综合发展计划 2.0(CADP 2.0) : 互联互
通和创新基础设施* 雅加达 , <[https://www.eria.org/publications/the-comprehensive-a](https://www.eria.org/publications/the-comprehensive-asian-development-plan-20-cadp-20-infrastructure-for-connectivity-and-innovation/)
[sian-development-plan-20-cadp-20-infrastructure-for-connectivity-and-innovation/>](https://www.eria.org/publications/the-comprehensive-asian-development-plan-20-cadp-20-infrastructure-for-connectivity-and-innovation/)

——— (2022), *亚洲综合发展计划 3.0 (CADP 3.0) : 迈向
综合、创新、包容和可持续经济* 雅加达,
[https://www.eria.org/publications/the-comprehensive-asia-development-plan-ca](https://www.eria.org/publications/the-comprehensive-asia-development-plan-ca走向一体化、创新、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
[走向一体化、创新、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https://www.eria.org/publications/the-comprehensive-asia-development-plan-ca走向一体化、创新、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

埃斯特班-普雷尔, J. 和萨瓦达, Y. (2014) , 《政策干预在结构性变化和经济发展中的
作用 : 战后日本案例研究》 *经济动力学与控制杂志* , 40(C), pp.67–83.

Evenett , S. , A. Jakubik , F. Mart í n 和 M. Ruta (2024) , “数据中的产业政策回
归” , *世界经济* , 47(7), pp.2762–88.

- Giorcelli , M. (2019) , “管理和技术转让的长期影响” ,
美国经济评论 , 109(1), pp.1–33.
- 全球创业监测 (2023) , *2022 / 2023 全球创业监测*
报告 : 适应“新常态” , 伦敦。
- 格林沃尔德和 J. E. 斯蒂格利茨 (2013) , “产业政策 , 学习型社会的创建 ,
 和经济发展” , 在 J. E. 斯蒂格利茨和 J. Y. 林 (编辑) , *产业政策*
革命 I , 伦敦 :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 , 第 43 - 71 页。
- 哈格德 , S. (1990) *来自边缘的路径 : 新时代的增长政治*
工业化国家 , 伊萨卡 , 纽约 :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 Haltiwanger , J. , R. S. Jarmin 和 J. Miranda (2013) , “谁创造工作 ? 小与大
 与 Young '相比*经济学与统计学综述* , 95(2), pp.347–61.
- 哈里森 , A. 和 A. 罗德里格斯-克莱尔 (2010) , 《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外国投资与
 工业政策》, 载于罗德里克 , D. 和 沃尔夫·罗森茨韦格 编 , 《*发展经济学手册*》 ,
 阿姆斯特丹 : 爱思唯尔 , 第 4039 - 214 页。
- Hasanov , F. 和 R. Cherif (2019) , “不应命名的政策的回归 : 产业政策的原则” ,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工作文件 ,
 No. 074, 华盛顿特区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19/03/26/The-Return-of-the-Policy-That-Shall-Not-Be-Named-Principles-of-Industrial-Policy-46710>>
- Hausmann , R. , D. Rodrik 和 A. Velasco (2008) , “增长诊断” , 载于 N. Serra
 和 J. E. Stiglitz (编辑) , *华盛顿共识重新考虑 : 迈向新的全球治理* , 纽约 : 牛津
 大学出版社 , 第 324 - 354 页。
- Hayashi F. 和 E. Prescott (2008) , “农业制度对战前日本经济的压抑作用” , *政治*
经济学杂志 , 116(4), pp.573–632.
- Hidalgo , C. A. , B. Klinger , A. L. Barabási 和 R. Hausmann(2007) , “产品空
 间条件国家的发展” , *Science* , 317(5837), pp.482–7.
- Howell , S. T. (2017) , “融资创新 : 来自研发资助的证据” , *美国经济*
Review 107(4), pp.1136–64.
- Hsieh , C. T. , E. Hurst , C. I. Jones 和 P. Klenow (2019) , “人才与美国的分配”
经济增长 , *计量经济学* , 87(5), pp.1439–74.
- Hsieh , C. T. 和 P. J. Klenow (2009) , “中国和印度的错配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学季刊 , 124(4), pp.1403–48.
- Hsu , W. T. , R. G. Riezman 和 P. Wang (2019) , “贸易的创新、增长和动态收益” ,
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 工作文件 , No.26470, 剑桥, MA: NBER, <https://www.nber.org/papers/w26470>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货币基金组织) ,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SPROLLs/world-economic-outlook-数据库#sort=%40imfdate%20降序> (2023 年 4 月 7 日访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4)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中的产业政策覆盖面 -- 广泛考虑” , 政策文件 , 第 2024/008, <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政策论文/议题/2024/03/11/产业政策覆盖在IMF监督中的广泛考虑-546162>

伊藤 , A. (2020) , “创新亚洲 : 后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增长模式变化” , 载于 K. Got o、T. Endo 和 A. Ito (编辑) , *亚洲经济 : 当代问题与挑战* 米尔顿公园 : Routledge , 第 129 - 46 页。

Javorcik , B. S. (2004) , “外国直接投资是否提高了国内生产率”
公司 ? 通过反向联系寻找溢出效应 , *美国经济 Review* 94(3), pp.605–27.

约翰逊 C. (1982) *MITI 与日本奇迹 : 1925 年产业政策的增长 1975* , 雷德伍德城 , 加利福尼亚州 :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Juh á sz , R. (2018) , “临时保护和技术采用 : 来自
拿破仑封锁 , *美国经济评论* , 108(11), pp.3339–76.

Juh á sz , R. , N. Lane , E. Oehlsen 和 V. C. P é rez (2022) , “产业政策的对象、内容、时间和方式 : 基于文本的 接近” , SocArXiv, <https://osf.io/preprints/socarxiv/uyxh9/>

Juh á sz , R. N. Lane 和 D. Rodrik (2023) , “产业政策的新经济学” , *NBER 工作 论文* , No. 31538, Cambridge, MA: NBER, <https://www.nber.org/papers/w31538>

Juh á sz , R. 和 N. Lane (2024) , “产业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 *NBER 工作论文* , 编号 32507 , 剑桥 , MA : NBER , <https://www.nber.org/papers/w32507>

Kalouptsi , M. (2017) , “工业补贴的检测和影响 : 中国造船案例” , *经济研究综述* , 85(2), pp.1111–58.

卡特尔 , R. , W. Drechsler 和 E. Karo (2022) , *如何建立企业家的国家 : 为什么创新需要官僚主义* , 新泽西州纽黑文 : 耶鲁大学出版社。

Kimura , F. , P. K. Wong 和 M. Ambashi(2019) , “东盟 2040 年的创新” , 载于 F. Kimura , V. Anbumozhi 和 H. Nishimura(编辑) , *东盟愿景 2040 第三卷 : 改造和深化东盟共同体* , 雅加达 : ERIA , 第 24 - 49 页。

克莱恩 P. 和莫雷蒂 E. (2014) , 《局部经济发展、集聚经济效应及大力推动 : 田纳西 Valley 权利委员会百年证据》
经济学季刊 , 129(1), pp.275–331.

Kohli, A. (2004), *国家主导的发展 : 全球边缘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 , 剑桥 , 英国 : 剑桥大学出版社。

克鲁格 , A. O. (1993) , *发展中国家政策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 马萨诸塞州剑桥 :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1995)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经验的政策教训” , 在
J. 贝尔曼和 T. N. 斯里尼瓦桑 (编辑) , *发展经济学手册* ,
阿姆斯特丹 : 爱思唯尔 , 第 2497 - 2550 页。

- 萊恩 , N. (2020) , “产业政策的新经验 ” , *工业杂志 , 竞争和贸易* , 20(2), pp.209–34.
- (2022) , “制造业革命 : 南方的产业政策与工业化 ” Korea ' , SocArXiv, <https://osf.io/preprints/socarxiv/6tqax/>
- 林 , J. Y. (2014) *追求繁荣 : 发展中经济体如何起飞* , 普林斯顿 , 新泽西州 :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刘东 (2019) , “生产网络中的产业政策 ” , *经济学季刊* , 134(4), pp.1883–1948.
- Luzio , E. 和 S. Greenstein (1995) , “衡量受保护的婴儿产业的表现 : 巴西微型计算机的案例 ” , *经济学与统计学综述* , 77(4), pp.622–33.
- Manelici , I. 和 S. Pantea (2021) , “工作中的产业政策 : 来自罗马尼亚收入的证据 ” IT 工人的税收减免 , *欧洲经济评论* , 133, 103674.
- Mazzucato , M. (2011) *创业国家 : 揭穿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神话* , 伦敦 : 国歌出版社。
- (2021) , *使命经济 : 改变资本主义的登月指南* , 伦敦 : 企鹅。

村上M. (2020), “产业政策影响的政策效果研究 : 国内外案例介绍”, 经济产业研究所 (RIETI), <https://www.rieti.go.jp/jp/special/ebpm_report/007.html> [日语].

Ohno K. (2009) ,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 重塑越南的产业政策制定 ” ,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经济公报* , 26(1), pp.25–43.

冈崎 , T. (2020) , “21 世纪的产业政策 : 对竞争的巨大价值 ” 在框架建筑中推广 ' , *日本经济新闻* , 5 月 29 日 [日文] 。

Pavcnik , N. (2002) , “贸易自由化、退出和生产率提高 : 证据 ” 来自智利植物 , *经济研究综述* , 69(1), pp.245–76.

佩萊格里尼 , G. 和 T. Muccigrosso (2017) , “补贴的新公司生存时间更长吗 ? 来自反事实方法的证据 ” , *区域研究* , 51(10), pp.1483–93.

Restuccia , D. 和 R. Rogerson (2008) , “政策扭曲和综合生产率与异质植物 ” , *经济动态回顾* , 11(4), pp.707–20.

罗德里克 (2004) , “二十一世纪的产业政策 ” , 约翰·F·肯尼迪学校政府(KSG) 工作文件 , No. RWP04 - 047, Cambridge, MA: Harvard 大学 , <https://drodrik.scholar.harvard.edu/publications/industrial-policy-twenty-first-century>

----- (2008), “产业政策正常化”, *增长和发展委员会工作文件*,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第 3 号: 哈佛大学, <https://drodrik.scholar.harvard.edu/publications/正常化-产业政策>

Rotunno, L. 和 M. Ruta (2024), “国内补贴的贸易溢出效应”, *IMF 工作文件*, No.2024/041, 华盛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24/03/01/Trade-Spillovers-of-国内补贴-545453>

Shu, P. 和 C. Steinwender (2019), “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生产率和创新的影响”, *创新政策与经济*, 19(1), pp.39–68.

斯蒂格利茨, J. E. 和 B. 格林沃尔德 (2014), *构建学习型社会: 一种新方法*
增长、发展与社会进步,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斯蒂格利茨, J. E., J. Y. 林和 C. Monga (2013), “产业政策的复兴”, *政策研究工作文件*, No.6628, 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16845>

斯蒂格利茨和 A. Weiss (1981), “不完全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 *美国经济评论*, 71(3), pp.393–410.

Tirole, J. (2023), “数字时代的竞争与工业挑战”, *年度经济学评论*, 15(1), pp.573–605.

Todo, Y. 和 Miyamoto, K. (2006), ‘外国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与当地研发活动的作用: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证据’, *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 55(1), pp.173–200.

联合国(UN), *可持续发展目标*, <https://sdgs.un.org/goals>

Wade, R. H. (1990), *治理市场: 经济学理论与政府作用*
东亚工业化,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2014), “美国产业政策的悖论: 伪装中的发展状态”, 在
J. M. Salazar - Xirinachs, I. Nübler 和 R. Kozul - Wright (编辑) *Transforming*
经济: 使产业政策有利于增长, 就业和发展,
日内瓦: 国际劳工组织, 第 379 - 400 页。

沃里克 (2013), “超越产业政策: 新出现的问题和新趋势”, *经合组织科学、技术和产业政策文件*, 巴黎第 2 号: 经合组织,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cience-and-technology/beyond-industrial-policy_5k4869clw0xp-en

世界银行 (1993), *东亚奇迹: 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 华盛顿特区。

ERIA 讨论论文系列

No.	作者 (S)	Title	Year
2024-33 (No. 540)	Rui Augusto Gomes	利用东盟成员资格 2025 年 1 月 东帝汶的发展： 问题和议	
2024-32 (No. 539)	渡边秀田，小仓 Ema， 大川佳田	东盟数据的现状 12 月 治理及其影响 2024 数字经济 框架协议	
2024-31 (No. 538)	伊藤忠志	特朗普关税和 11 月的回旋处 贸易	2024
2024-30 (No. 537)	Prabir De，Komal Biswal Venkatachalam Anbumozhi	和确保地区太阳能供应 11 月 链：决定因素和 东北防备 印度和东盟地区	2024
2024-29 (No. 536)	Phoupphet Kyophilavong, Shandre Thangavelu, Inpaeng Sayvaya 和 Phongsili Soukchalern	游客 11 月的决定因素 老挝人民 2024 年的支出 民主共和国	
2024-28 (No. 535)	凯西·李	城市设施与贸易 Covid - 19 2024 期间的弹性 马来西亚的大流行	11 月
2024-27 (No. 534)	塞巴斯蒂安·奥利维拉， 佩德罗·西蒙	杰伊·拉菲，美国的影响 外国货币政策 公司：债务到期了吗 重要吗？	九月 2024
2024-26 (No. 533)	Kazunobu Hayakawa 和 Sasatra Sudsawasd	9 月贸易转移的影响 中国在美国市场 2024 关于第三国的工资： 来自泰国的证据	
2024-25 (No. 532)	Jung Hur 和 Chin Hee Hahn	审查 2011 年 9 月的影响 2024 年日本地震 中的生产网络 大韩民国：企业层面 数据分析	
2024-24 (No. 531)	Nobuaki Yamashita 和 Doan Thi Thanh Ha	9 月的第三国效应 2024 年美中贸易战 关于越南	
2024-23 (No. 530)	Ketan Reddy, Subash Sasidharan 和 Shandre Mugan Thangavelu	经济政策 不确定性影响公司 GVC 2024 参与？微观数据 来自印度的证据	九月

前几年的 ERIA 讨论文件可以在以下位置找到：

<http://www.eria.org/publications/category/discussion-papers>